



智量·著

Lun  
Shijiu Shiji  
Eluosi Wenxue

# 论19世纪俄罗斯文学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19世纪俄罗斯文学/智量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7-309-06703-3

I. 论… II. 智… III. 文学研究-俄罗斯-19世纪 IV. I512.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03207号

论19世纪俄罗斯文学

智 量 著

---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 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00562(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

责任编辑 曹珍芬

出品人 贺圣遂

---

印 刷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

开 本 890 × 1240 1/32

印 张 13.75

字 数 275 千

版 次 2009年8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

书 号 ISBN 978-7-309-06703-3/I · 495

定 价 25.0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

---

尊智量师之命，为他的文集写一个序。

智量师年高德劭，想想也难以找到可为他写序的老人了。此前我刚刚为他编了一个八十华诞的集子，书名叫做《一个不老的老人》，喻示着智量师年轻的心态；而我也到了知天命的年纪，心态突然迟暮了下来，似乎走路的步子也较智量师慢了些。所以我们师徒二人也就扯平了，我出集子请他写个序，他出集子就我来写吧。

我与智量师相识是在 1984 年的夏天，至今已有二十五年了。当时是在苏州的一个外国文学讲习班上，我是高校的年轻教师，他是讲习班的主讲专家。我 1982 年开始在河北师大教外国文学课，并自学俄语及俄国文学。在与智量师结识前我已读过他的多篇论文，心中十分仰慕，所以见面后便决定要报考他的研究生。第二年考试，尽管我的成绩并不理想，但还是侥幸与王圣思、王璞、刘文荣和戴耘一起成为智量师的开门弟子，从此有了整整三年跟从他耳提面命的学习生活。我觉得，一位好的老师，影响学生更多的是他的生活方式，在潜移默化中灌输他的生存理念，这也许比告诉学生如何做学问更为重要。但随着对智量师理解的加

深,我知道,他的生活是我们这一辈人无法仿效的。因为他的一生承受了太多的苦难,肉体的折磨,人格的屈辱,亲人的离散,生活的艰辛,这一切造就了他在夹缝中求生存、隐忍和执拗杂糅、现实与浪漫相伴的生活态度。严格地说来,这样的生存条件是不适于做研究工作的,但他坚持了下来,不过他被迫选择了在这个苛刻的环境中较能施行的翻译工作,在他中断职业、在社会底层挣扎的二十年时间里,他在碎纸片上翻译了《叶甫盖尼·奥涅金》,无论是在太行山的山沟里,还是在大西北的黄土高坡上,无论是在碣石山下锄地的农民中,还是在黄浦江边的搬运工里,他都在心中揣着这部伟大的艺术作品,默念着其中的诗句,保持着对俄罗斯文学的热情。这个时候,普希金、屠格涅夫或托尔斯泰已不是一个文学史上的符号,而成为他生命的牵挂。所以,当“文革”结束,他重返校园研究俄国文学的时候,这种生命的激情便成为一种惯性保持下来。而这,却是我们心向往之而永远无法具备的一种素质了。

因此,当人们拿到这本集子的时候,相信他们也会读出在本来枯燥的研究性文字之中蕴含的对生命的热情与感悟。在我的理解中,研究应当有三个层面:一是技术的层面,这是基本的规范、材料、方法层面的研究;二是创见的层面,这是专业的价值判断、意义推论层面的研究;三是思想的层面,这是文学研究应当具备然而难以达到的境界。也就是说,文学研究应当把自己对生命的体验和感悟贯注于文本现象的解析性研究,它应当照顾到文本对象的整体性。这种整体性不仅指文本作为一个完整艺术对象的特性,更

重要的是,它应照顾到文本与人的精神活动——作者、读者及一般意义上人的共同精神活动——的统一。对于文学研究而言,技巧出色、材料积累、方法得当固然是必要的,有过人的见解、填补空白的阐释固然是必要的,但这些仍然不够,研究者还必须在文本对象中倾注进自己全部的情感,发现文本的生命意义,这才是文学研究不同于其他学科研究的唯一特性。正因为智量师是在这种研究中延续着自己的对生命信念的追寻,所以他的文章读起来让人总是感受到活生生的作者的存在。正如他在《屠格涅夫〈散文诗〉的艺术风格特征》中说的:“文如其人,或者,换句外国话说,风格即人。”其实,我仔细想想,智量师之所以主要选择普希金、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是因为他本人的个性更接近于这三位伟大的作家。普希金生性自由、狂放不羁,而智师量从天性上看更像一个诗人,1950年代末,他因言获罪,被逐出京城,在流放地,他一忍再忍,直到身染重病仍不得休息,于是愤而辞职,成为戴着“右派”帽子的自由民;屠格涅夫浪漫而热烈,久居异国深恋故土,而智量师即使是在生命最坎坷的时候,也从未丧失坚强的信念,总是怀抱着美好的梦想,直到八十岁高龄还在译诗、绘画、写作等多个领域奔忙;托尔斯泰执著而深刻,胸中充满着宗教情怀,而智量师个性刚烈,从未曾曲学阿世,他坚守着自己的生命态度,深挚地、悲悯地,同时也嘲讽地、冷冷地面对着这个带给他痛苦和幸福的世界。也许在智量师的心目中,这些作家就是他自己生活不同侧面的写照,所以他对他们的研究更多的不像是理性的辨析,而是对个体生命感情的描

述,散淡自如而体味真挚。这样的研究也许是大多数职业研究者所永远无法领略的境界。

智量师首先是个翻译家,其次才是研究者。除了《叶甫盖尼·奥涅金》,他还译了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前夜》、《贵族之家》,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宁娜》等等。也就是说,他的研究是建立在对文本极为熟悉的、反复的感性阅读之上的。他在回忆文章中曾记述过当年翻译的情形:

在太行山麓小米峪山村外,有一天,在蓝天白云下,我一边双脚交替地踩着刚刚撒下旱稻稻种的田垄(为了把土踩实),一边借助这一动作的节奏,默念着《奥涅金》中四音步轻重格的诗行,再一句一句地把原诗按照我给自己定下的方法在心中翻译成中文,也要它和我脚下的节奏,均匀起伏地一句句流淌出来……记得那一天,我从平山县西边一处小山坡上把一块据说是含有铁矿的石头(大约有一百来斤重)背往县委所在地洪子店的炼钢场地的途中,我一直在心中反复推敲,寻找一节诗的韵脚,于是也忘记了脊背上的重负。

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研究,除了上面说的带有天然的生命体悟之外,也加强了智量师对文本形式的格外敏感。在上世纪 80 年代之前,由于中国批评界的指导思想和苏联研究界的影响,国内对俄国文学的研究多集中于其思想内

容方面,而较少有文章对其艺术成就进行深入的探讨。而智量师基于翻译实践的研究,则能把复杂的表现形式表达得十分易于理解。比如《〈叶甫盖尼·奥涅金〉艺术特点略谈》中对作品双重叙事的解说,他指出长诗中那个抒情主人公的塑造乃是受拜伦影响而来,并且代表了诗人真实的自我,以典型的浪漫主义手法来抒发诗人自己的思考和复杂情感,因此,“我”的出现使作品有了双重线索,拓展了作品的内蕴。但他同时又分析道,普希金不同于拜伦的是,作品中的“我”与叙事主人公又同时处在一个线索里,诗人把“我”描写成叙事主人公的朋友,使之加入故事的整体形象体系之中。而抒情主人公的这种特殊地位,使得叙事主人公奥涅金更具时代感,更具复杂性。因为抒情主人公对叙事主人公采取的是整体认同的态度,这一关系使读者面对客体化的人物形象能够获得更为亲切的感受,同时也引发对“多余人”这一现象的深思。再如这篇文章针对某些评论者对其艺术结构的模糊认识,提出前六章与后两章构成外在不平衡、不匀称而内在平衡对称的观点。他的根据首先是普希金本人的手稿,上面在第六章之后注明“第一部结束”,那么为什么呢?这还要从文本来加以说明:前六章以写奥涅金为主,描绘的是乡村生活;后两章则以达吉雅娜为描写中心,主要写城市生活。所以文章指出:“作品的结构不仅仅是一个篇章比例的概念,它也应该包含作品的情节结构和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内容的结构在内。”可见智量师对结构的划分是建立在对原作及相关材料十分熟悉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写起来就像谈论自己的写作意图一样,不故作深

奥,明白晓畅。其实,这样的分析研究与其说是一种风格,不如说是一种品格,它代表着真诚、自信与冲淡。

在智量师研究工作最集中的那个时期,国内的理论界还没有大量引入西方的各种理论方法,所以,读者如想在这些文章里找那些新奇的东西可能会失望,但或许也正因为如此,这些文字便少了一层理论框架的过滤,多了一份发自肺腑的真情。我在今天读着它们,脑海里马上就浮现起智量师坐在华东师大一村蜗居中的懒椅里、叼着烟斗、娓娓而谈的样子,嘴里不时发出舒畅而狡黠的笑声,露出掉了一颗牙齿的缺口,屋子里洋溢着平实亲切的气氛。我想,如今的学术,尤其是文学研究,似乎越来越缺少生活的气息,所谓生活气息,实际就是与人的生命完整性相关的东西,这也似乎就是所谓后现代的特征吧。在我们陷入这个后现代困境中的时候,我常常想起与智量师在一起的时光,在我的生命历程中,那是让我真正建立起自我意识的日子,因此,在这个意识里,智量师就刻下了他深深的影子,这个影子一直伴随我学习、工作、生活,时刻提醒着我一步步走向生命的完整。我没有奢望这里辑录的文字能给大家带来这样的影响,但还是期待着,它们能告诉今天的读者,曾有一位经历过无数磨难的智者,怎样通过俄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不断改写着一个人的历史。

学生 王志耕

2009年6月于南开大学



# 目 录

---

- 1 19 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主要特点
- 39 19 世纪俄罗斯文学与俄国文化
- 55 论普希金的诗歌
- 71 论《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形象体系与创作方法
- 86 请作家朋友们重读《上尉的女儿》
- 96 诗歌与小说的结合——从莱蒙托夫的《唐波夫财政  
局长夫人》看俄罗斯诗体小说的艺术特点
- 108 梅思金公爵的十五个小时——有关陀思妥耶夫斯  
基小说的一些思考
- 124 《俄罗斯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评介
- 131 赫尔岑和他的《谁之罪?》——兼谈俄罗斯“问题小  
说”的一些特点
- 150 论屠格涅夫思想的两个主要方面

|     |                                |
|-----|--------------------------------|
| 164 | “小说家之中的小说家”——屠格涅夫小说艺术特点散论      |
| 198 | 《猎人笔记》与屠格涅夫的人道主义               |
| 208 | 简论《贵族之家》                       |
| 219 | 关于屠格涅夫的《门槛》                    |
| 242 | 孤独——屠格涅夫《散文诗》创作意识的核心           |
| 261 | 伟大的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托尔斯泰词典》的编者前言  |
| 275 | 关于列夫·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问题           |
| 325 | 论《安娜·卡列宁娜》的人物形象和艺术手法——译本序言的一部分 |
| 342 | 《复活》的创作过程与作家的思想发展              |
| 361 | 论文学的民族接受——《俄罗斯文学与中国》一书的绪论      |
| 400 | 附录 一本书与一个国家的命运                 |
| 431 | 后记                             |



19 世纪俄罗斯民族的文学自普希金始,一发而不可收,势如江河奔腾,形成近一百年的洪流,为人类文化发展史和世界文学史写下光辉的一页。纵观全局,有它的一些主要的特点。

最主要的一个特点是它与俄罗斯人民解放运动的密切联系,以及它为俄罗斯人民解放事业服务的目的性。

俄罗斯文学是直接为俄罗斯人民的解放斗争服务的。人民群众为解放自身所作的斗争,广大农奴和城市下层人民的悲剧生活与命运,是 19 世纪俄罗斯文学所描写的中心题材。18 世纪末期,拉吉谢夫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冯维辛的《纨绔子弟》和克雷洛夫的许多寓言,已经在这方面为后来的俄国作家树立了榜样。19 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奠基人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强盗兄弟》、《叶甫盖尼·奥涅金》和他的《乡村》等抒情诗以及著名短篇《驿站长》,都描写这样的题材。普希金以后的作家无不以描写这

样的题材为主要任务。莱蒙托夫的《瓦吉姆》，果戈理的《死魂灵》、《塔拉斯·布尔巴》、《外套》，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赫尔岑的《喜鹊一小偷》，葛里高罗维奇的《苦命人安东》，彼塞姆斯基的《一千个农奴》，涅克拉索夫的《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谢德林的《外省散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托尔斯泰的《一个地主的早晨》、《复活》等，都是如此。俄罗斯文学以歌颂自由、歌颂革命、歌颂人民作为传统主题，《自由颂》的题目一再出现在几辈大诗人的笔下，对十二月党人思想的歌颂贯穿在以雷列耶夫直到涅克拉索夫的诗篇中，从普希金的《鲍里斯·戈杜诺夫》和半个世纪以后出现的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都把人民作为决定历史发展的主要力量来表现。在相反的方面，俄国贵族地主和反动统治者以及一些新兴的资产阶级分子，便成为俄罗斯文学中一贯批判揭露的对象，即使沙皇本人，俄国作家也不回避去触及他。比如，托尔斯泰的《哈吉·穆拉特》中便为尼古拉一世塑造了一个狰狞的形象。19世纪俄罗斯文学之所以在全世界人民心中得到那么热烈的响应，正是因为它的这种与人民解放运动的密切联系和为人民解放而服务的斗争性。俄罗斯文学，恰如鲁迅先生所说，是“为人生”的文学。它是战斗的文学，是在一切被压迫人民的生活中起着“导师和朋友”作用的文学。另一方面，俄罗斯文学正是在它和人民解放运动的这种紧密联系中，得到了蓬勃发展的主要保证。俄国19世纪的文学为我们证明了只有为人民的文学，才能得到人民的喜爱，只有“为人生”的文学，才可能写出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生。

我们平时在谈论俄罗斯文学的特点时,首先提到的往往是它的人民性、爱国主义、人道主义。这些特点都来自它和人民解放运动的密切联系,来自它为人民、“为人生”的这个根本上的特点。文学的人民性不是表现在其他方面,主要表现在文学和人民解放运动的联系上,表现在它能够传达人民的希冀、愿望,能够代表人民的利益,为人民的幸福和美好生活而斗争。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在他们指导俄罗斯文学健康发展的时候,时时不忘指出文学的价值和力量来自它与人民解放事业的联系。别林斯基在比较克雷洛夫和卡拉姆静笔下的农民形象时就曾经指出,后者所描写的农民之所以不够自然、不够真实,原因在于他更多是立足于 18 世纪法国人的观点和俄国贵族的观点,而不是俄国人民的观点。车尔尼雪夫斯基在 19 世纪 50 年代即对托尔斯泰的早期作品作出极高评价,因为他看出,这位当时初露头角的大师“善于钻入农民的灵魂中”。俄国的伟大作家很了解怎样以他们的文学为人民的解放而服务。果戈理号召俄国作家要会写出人民的愿望、思想和内心世界,而不要只会写人民的衣衫。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评论俄国作



车尔尼雪夫斯基像

家达里(1801—1872)的小说时说,他的作品中“看不到一点人民性”,问题在于他不理解文学应该怎样描写人民才能和人民的利益相适应,并为人民服务,说他好比是一个马车夫,他可以驾轻就熟地送你到彼得堡的每一个小胡同里去,

但却不能帮助你了解和认识彼得堡。

俄罗斯文学中浓烈的爱国主义感情也是来自它和祖国人民命运的密切联系。19 世纪俄罗斯文学一方面因为承受了从《伊戈尔远征记》开始的为祖国命运而担忧的传统,一方面也由于本身与俄国的现实生活和俄国人民的斗争的密切联系,才能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爱国主义的典范。为祖国人民的解放而服务的目的性,使俄国作家具有一种社会责任感。如雷列耶夫所说:“我不是一个诗人,我是一个公民。”车尔尼雪夫斯基明确提出文学应该促进祖国的富强。即使像屠格涅夫这样的西欧派自由主义作家,他也是把推翻农奴制度、为祖国繁荣富强而斗争作为自己写作的自觉的目的的。

说起人道主义,它当然是 19 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一个特点,但它也是俄罗斯文学与俄国社会革命运动密切联系这一根本性特点所决定的。欧洲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者以人为本、为民请命的思想,在 19 世纪的俄国,体现为把广大农奴和城市下层人民当人,为他们的解放而斗争。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接受了西欧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文学以来的这一先进思想影响,结合俄国的实际,把它运用得很有力量。但同时,也应该看到,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俄国作家的人道主义是属于资产阶级世界观范畴的人道主义,这些作家思想上看不见社会发展的远景,他们在同情人民、为人民的解放而斗争的同时,又不免带有某种程度的朦胧、抽象甚至悲观的因素。

19 世纪俄罗斯文学中带有普遍性和传统性的一些重要

人物形象,往往都是由于它与现实斗争的密切联系才出现的。比如,多余人形象和新人形象便是如此。多余人形象的出现是 19 世纪前期俄罗斯文学的重要现象,只有从文学与革命运动的联系的角度才能理解这类人物形象的实质和时代意义。不错,多余人是软弱的,他们不是革命者,这是他们“多余”的原因。然而,另一方面,正是因为生活中出现了革命的力量,这类人才会拒绝与他们所出身的阶级同流合污,而沦为“多余”。奥涅金和毕巧林蔑视环境、高于环境、否定环境的思想根源来自于当时社会上先进的革命思潮。而多余人形象的发展也直接反映出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到了 50 年代末期,即冈察洛夫笔下的奥勃洛摩夫的时代,多余人已经可以说是不再“多余”了,这些软弱无力的贵族青年身上的革命性已随历史潮流而消退。《奥勃洛摩夫》这部作品的出现,表明新的时代和它的新英雄——平民革命知识分子——已经出现。新人的形象更能从正面表现出俄罗斯文学与现实斗争和社会运动的密切关系。为了促进革命运动的发展,推动时代向前进,文学必须提出自己的理想,必须歌颂它所肯定的东西,必须表现出生活前进的方向来。19 世纪中叶俄罗斯文学中的新人物形象便是应这种历史要求而产生的。

其实在 19 世纪以前俄罗斯文学的历史上,文学和现实的联系以及它为生活前进发展而服务的意向也是一贯表现在正面主人公形象身上的,罗蒙诺索夫笔下的彼得大帝、拉吉谢夫笔下的“受洗礼的贵族”雷列耶夫的依凡·苏萨宁、格列包耶陀夫的恰茨基,都是这一类的形象。19 世纪前期,

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等也很注意在批判的同时树立自己的理想。多余人形象在它出现的早期,本质上也是正面主人公形象。19 世纪俄罗斯文学发展到 50—60 年代,才在它和生活斗争进一步的和自觉的联系中,注意到了一种新的正面主人公形象,当时只有描写这样的人物,才能及时迅速地反映出现实的动向和人民的要求,这便是巴扎罗夫、洛普霍夫、基尔沙诺夫、维拉·巴夫洛夫娜,尤其是拉赫美托夫这些新人形象出现的历史和文学的背景。

总之,俄罗斯文学主要是由于它与社会革命运动、与人民的解放斗争密切联系才取得它的种种成就的,这是它的一个最为主要的特点。卢卡契说:“当我们要研究俄罗斯人民解放和成长的历史时,我们绝不能忘却文学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没有一种社会生活比得上俄国那样受到文学的巨大的激动和影响。”他的这些话是说得很对的。

## 二

19 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又一个重大特点是它鲜明的民族性。它是俄罗斯民族自己的文学,它是以其独特的民族特征而立足于世并影响其他民族的文学的。

任何一种真正有特色的文学都必须是民族的文学。任何一个真正伟大民族的文学,都必定带有自己本民族的特色。俄罗斯民族有它自己的历史发展过程和民族特性,这些不可能不表现在它的文学上。19 世纪以前的古代俄罗斯

文学流传下来的遗产虽然不多,但是一些优秀的作品如《伊戈尔远征记》、《拔都侵袭梁赞的故事》、《彼得和费夫朗尼亚的故事》、《硬鳍鲈鲈的故事》等,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与俄罗斯人民的生活习俗以及思维方式等有密切联系。彼得大帝赖以振兴俄国的方法是大量引进西欧的技术和文化。这使得 18 世纪的俄国在许多方面都模仿西欧,文学也不例外。但是,在 18 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模仿性之外,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即使在那个世纪里,俄罗斯文学也还是俄国的文学。俄国的古典主义与西欧的古典主义就很不相同,比如,俄国 18 世纪古典主义剧作家中有不少人并不认真奉行“三一律”,发展到 18 世纪后期,普拉维尔希科夫甚至根本抛弃了它。俄国古典主义作家从康捷米尔开始,直到后来的赫拉斯科夫等人,都倾向于描写俄国现实生活的题材,或者借古而讽今,带有明显的现实主义因素。所以,人们往往把这批 18 世纪的俄国作家不称作古典主义者而称作“伪古典主义者”。18 世纪末期出现在俄国的感伤主义,它从欧洲感伤主义那里“引进”的更多是文学的语言和结构体裁等形式,它的主导思想是当时俄国一批贵族作家面临时代转变而流露出的一种“危机感”,而不像西欧感伤主义那样表现的是新兴资产阶级情绪。当 19 世纪初叶欧洲浪漫主义文艺思潮传入俄国之后,也被俄国人改造得又“土”又“洋”,用来适应他们反映自己民族生活内容的要求。俄国的浪漫主义无论积极派或消极派,都跟史达尔夫人或夏多布里昂的浪漫主义有所不同。以雷列耶夫和早期普希金为代表的俄国积极浪漫主义所主要反映的并不是资产阶级情绪,而是一批